

現代徐霞客——丁文江

徐 慎 絨

龍公垂青康聖解囊

被胡適推崇爲「我們這個新時代的徐霞客」，傅斯年譽之爲「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一生中的軼事極多。但是他的死却十分之悽慘，因爲那是一次應該可以避免的悲劇，所以有人說他是被誤死了的。三十多年來，丁文江之死，還是鮮少爲人提及的一段秘辛。

丁文江，字在君，江蘇泰興黃橋人，十一歲那年正在讀私塾，北京城裏掀起了百日維新和戊戌政變的瀾天浪潮，居然會影響了這位「少年中國的新少年」，他和他的幾位同學相約，從今而後不再學那八股制藝，不再臨帖習字，而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實事求是，不尚虛浮，於是他們從攻讀正史着手，研究他們所謂的「實學」，大家發奮努力，用「實學」來報國。當時，他這幾位要好同學是他的一位本家叔祖，一位表叔，和他的大哥。

十四歲那年，丁文江想到上海去讀南洋公學，照南洋公學的規定，學生入學必須經由原籍的知府知縣先行甄試，然後備文保送，當年泰興的知縣是龍研仙，他有心難一難這位維新少年，給他出了個題目「通西南夷」，不料正好是丁文江平素研究興趣之所在，他迅速完篇，文采斐然而議論風生，使龍研仙看了大爲激賞，登時就勉勵他說：

「你有這麼好的資質和根柢，何必上什麼南洋公學，如今朝廷正在倡行遣送學董留學，你何妨多等一個時

期，我設法保你到日本去就讀。」

丁文江很高興，謝了這位知縣大人，回家靜候佳音。第二年，他才十五歲，就由龍研仙託由胡子靖帶領，飄洋過海的到了日本。

他在日本補習日文、英文，認識了不少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其中交往最密的，有常熟翁之麟、翁之谷兩兄弟，和溧陽的史久光，都是有血性，懷大志的青年人，矢志革命，一心報國，翁之谷和史久光，後來曾在南京光復之役，先後當過革命軍聯軍總司令徐紹楨的總參謀長。丁文江受了這幾位朋友的影響，也開始鼓吹革命，大寫文章，每期必讀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

十六歲，約了兩位同鄉同學，轉赴英國，決心到英國去學海軍，學成後便參加革命。三名少年手中根本就沒有多少錢，而且連英國的地理位置也摸不大清楚，貿貿然的動了身，原訂計劃是到達英倫下了船就去愛丁堡，找同鄉前輩吳稚暉先生幫忙入學。三個人上了船一路花錢遊玩，毫無顧慮。直到有那麼一天，丁文江偶然聽船上的人說起，愛丁堡離他們下船的地方還遠得很，再一問，一算，三個人剩下的錢連買車票都不够，這才大大的着慌起來。

同船坐頭等艙的一位福建人方先生，時常和這三位少年聊天，船抵新加坡，方先生約他們一同下船去拜訪他的朋友林文慶。林文慶請他們吃飯，提起戊戌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正在檳榔嶼。丁文江曉得所乘的船將在檳榔嶼停一天，當時就靈機一動。

船抵檳榔嶼，三名少年找到了康有為的住處，登門求謁。康有為居然也就接見了他們，聽過了他們的志向，問明白他們的窘況，康有為說他不能袖手不管，當場送了他們十個金鎊，再托他們帶一封信，給他在倫敦的女婿羅昌。後來，羅昌也曾滙過二十金鎊接濟他們，有了這三十金鎊方使這三位少年免於淪落在倫敦，而且還

維持了一段時期的生活。雖然錢是三個人用的，但是丁文江向以平生不負一文錢的債而自傲，當康有為病歿之前，他曾折合法幣一千元歸還。三個人一到倫敦，因為旅費有限，不敢耽擱，當夜就從英格蘭的倫敦，坐長程火車到蘇格蘭的愛丁堡，他們見到了吳稚暉先生，一談之下，大失所望。

頭一樁是英國政府和滿清政府有約定，非經滿清政府保送，中國留學生不許學海軍。第二樁，吳稚暉一輩子鼓勵國內年青子弟出國留學，但是他却以他本人刻苦耐勞，一切將就的生活程度，為留學生的需用作預算。丁文江他們三個，正是聽到吳稚暉說在英國留學一年能有六百塊大洋儘够，因而才在學了幾個月的英文之後，就大膽冒險的上了英國。及至愛丁堡一問，六百塊大洋一年只够住房子和吃飯，衣着零用和學費，那就毫無着落。——吳稚暉倒是很週到的替他們把住處都租好了，然而丁文江和一位李祖鴻一來過不慣那種苦日子，二來他們覺得既然出了國當然以讀書為第一，於是他們和吳稚暉分道揚鑣，留在愛丁堡繼續學英文，靠家中的接濟過活。吳稚暉則帶了那位家中實在籌不出錢來的莊文亞，到利物浦去苦苦渡日。

中國少年名噪異邦

很幸運的碰到一位在中國陝西傳過教的約翰新·密勒醫生。辛密勒問起丁文江的近況，他說他家裏一年只能寄來有限的錢，住在愛丁堡這樣的大城市，難免時有捉襟見肘、羅掘俱空之感。密勒醫生就說你何不到鄉下去讀書呢？費用省，讀書環境又清淨。十六歲的丁文江和李祖鴻，便因密勒之介紹，搬到了密勒的家鄉，英國東部的斯堡爾丁小鎮，當地只有幾百戶人家，却是辛密勒醫生的親戚朋友很多，生活程度也很低，密勒的親友很照顧這兩位中國來的少年，經常請他們喝茶、吃飯。

丁文江進了斯堡爾丁中學，過的還是窮學生生活，一個星期的食宿費祇要十五個先令，合三十塊大洋。學

費包括書籍得一百多元，兩者相加起來，即令一件衣服不添，一文錢的零用都不花，一年的費用，也還得一千七八百大洋左右。

丁文江在英國唸中學，既聰明，又用功，所以他能一年跳三級，花兩年功夫就把英國中學的全部課程讀完。不過，這兩年他過的非常之苦，英國的東部那麼冷，他一共只有一雙鞋，兩雙襪子，一雙穿在腳上，一雙在洗衣店裏。每逢下雨落雪，襪子打濕了，就唯有脫下向火烘乾。但是每天回住處吃中飯的時間很短，通常都是襪子還沒烘乾而上課時間將到，迫不得已，便穿上濕襪子趕去上課。就這兩雙襪子還會勞動房東太太爲他一補再補，房東太太心腸好，不收他補襪的錢。

鞋子呢，不到一年就穿破了，沒有錢買，他就拖着那雙破鞋子讀到中學畢業。

縱使在兩年之內連跳六級，丁文江仍能每次考試都得第一。使得小鎮中人無不爲之津津樂道，中國少年真是特殊的聰明。在丁文江未曾進入斯堡丁爾中學之前，期期拿第一的是當地少年斯金諾，斯金諾因爲丁文江搶去了全部第一名，大爲不服，他曾潛入教員室偷看丁文江的卷子，這一看之下却又使他把丁文江佩服得五體投地，主動的和丁文江結爲好友。斯金諾後來得了文學博士，在沙賴省一所最大的中學擔任校長。

書讀得好，平時又吃苦耐勞，很講禮貌，丁文江獲得當地居民的重視和喜愛，使他結識了不少「大」朋友。但他在斯堡丁爾也有兩件事情完全失敗，其一是當地班奈爾夫人的五小姐教他學鋼琴，他學了兩個星期方始學會了彈『甜蜜的家庭』，可是事隔不久，班奈爾小姐再彈這一曲，問他是什麼曲子時，他竟茫然不知所對。氣得班奈爾小姐聲言從此不再教他。經由這一次失敗的教訓，丁文江從此自認他「沒有音樂耳朵」。

其二是騎馬，丁文江十五歲東渡日本時，受了一股革命志士，士官學生的影響，也曾有投身軍校，革命報國的雄心壯志，他曾特地到體育會去學騎術，人騎在馬上，教師站在場地中間，用一根長繩子把馬栓住，然後

揮舞長鞭，使馬繞着圈子跑，由慢而快，等到馬跑到極快時丁文江還不會落下馬來，再讓他去了馬鐙，放下韁繩，兩手在胸前、胸後輪流交叉。丁文江學了許久，却只能學到快跑為止，一取下馬鐙他便非摔下馬不可，屢試屢驗，毫無進步，一氣之下，他乾脆不學了，丁文江沒在日本留下考士官學校，而遠赴英國想學海軍，自知騎術一關很難通過，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英國斯堡丁爾，又曾有一位庫克先生的老僕，教丁文江騎馬，在庫克家門前那塊碧油油的草坪上，老僕爲了激發丁文江的勇氣，故意揮鞭趕馬，讓丁文江所騎的馬拔足飛奔，結果是害得丁文江險些摔死。留英七年，準備返國之前，丁文江對自己學不好騎術還不死心，他又進了一間英國的馬術學校，英國騎術教師的教法是由小跑而疾馳，然後再跳離地兩三尺高的木桿，丁文江却又一跳木桿必得摔交。自此他就不再努力嘗試了，爲此他還下了個結論：

「一個人若爲天才所限，縱使積極訓練，到了相當的程度，也很難再進一步。」

一手建立地質調查所

畢業於斯堡丁爾中學後，丁文江很順利的考取了世界聞名的劍橋大學。如所週知，這是一所需費極昂的貴族學校，丁文江深知他家中無法負擔巨額的費用，但他又不願放棄這大好機會，無可奈何之際，他便硬起頭皮上書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請求補助，端方倒還當件正經事辦，指定泰興縣每年津貼公費數百元。然而這區區數百元加上丁文江家中悉索敝賦，匯到英國來的錢，距離實際需要尚遠。丁文江在劍橋大學實在維持不下去，唯有忍痛犧牲學業，不再進劍橋。同時又因爲英國大學學制學年之間不准轉學插班。丁文江就渡過英法海峽，遊歷歐陸，他在瑞士洛桑住過一段時期，埋頭準備功課。

第二年夏天，丁文江就讀於英國格拉斯哥工學院，預備翌年投考倫敦大學醫科。光緒三十四年他遭逢了一生僅有的一次考試敗績，投考倫敦大學醫科時有一門功課不及格，使他又放棄了學醫的念頭，入格拉斯哥大學攻動物學，並以地質學爲副科之一。讀到三年級時，他又將地質學和動物學並列爲主科，再選一門地理學爲副科。在格大就讀期間，他幸獲清廷駐英公使汪大燮之助，得了每月十鎊的半公費。民國前一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學以動物學和地質學的雙料學位畢業。當時汪大燮已答應他設法改爲全公費，但是丁文江却將全公費讓給了在英尚未完成學業的李祖鴻，自己啓程回國。李祖鴻感激之餘，乃將補領的一至五月官費一百餘鎊，全部選給了丁文江，得了這一筆錢，他方始有了成爲「新時代徐霞客」的機會。

因爲丁文江一輩子最敬佩明代的大遊歷家徐霞客（宏祖），最愛讀徐霞客遊記，在他一生之中，他曾花費很多的時間與心力，整理徐霞客遊記並繪製地圖，又曾編寫「徐霞客年譜」，他尤其宣稱徐霞客是發現金沙江爲揚子江上游之第一人。所以，當他留英七年，得了雙料學位返國，身畔又有一百多個金鎊，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帶一本「徐霞客遊記」在身邊，由英倫赴西貢，轉赴老開，深入我國的雲南、貴州、西康、四川四省，作地理地質的調查旅行，同時也是了了一身的金沙江流域探奇歷險，換一句話說，他要親歷當年徐霞客到過的地方，繼徐霞客而獲得更重大的發現。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壯舉，丁文江也因而一舉成名天下知，成爲近代中國最有成就的地理學家。

丁文江循着三百年前徐霞客所走的路線，由雲南北上深入金沙江，從民前一年五月十日抵達滇越邊境的雲南老開，步入國門，一直到民國三年五月十日方始第一次望見金沙江。不過在這四年間他還回過一趟家鄉，辛亥武昌首義的當時他正在蘇州成婚，新婚夫婦剛回到泰興黃橋故里，南京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聽從他女婿翁之谷的勸促，卽將在南京城外的秣陵關舉義，由翁之谷出任徐紹楨的參謀長，不久翁之谷病逝，聯軍參謀長乃由史

久光繼任，翁、史二位都是丁文江在日本所結交的好友，所以翁史在任職期間，都曾函電交馳，以聯軍秘書長一席屬諸丁文江。可是丁文江這時候已自革命救國論者一改而為建設救國論者，其實是風光絕美的金沙江引得他入了迷，他跟四川一家礦業公司訂得有約，一年後將往擔任地質工程師，繼續他的金沙江探險之行。

在二度入川初見金沙江前，民國二年，丁文江應北京工商部鑛政司司長張軼歐之邀，上北京就任工商部會事，兼地質科科長。在他當這名小京官的時期，他得工商部總長張狀元張謇之支持，成立了「地質調查所」，是為中國第一個在國際上有地位的學術機構。不久以後，他便重溫舊夢，再度入川。

在滇發現天下奇觀

民國三年五月十日，丁文江從石臘他岔路改向西北，一路策杖步行，走了十公里以後，經過楊家村西的大嶺，高出海拔兩千七百六十公尺，就在大嶺之上，他朝北方一望，居然望到了金沙江，多年的夢想，終告如願得償。他所見到的那一段金沙江已經高出海拔一千一百公尺，距丁文江置身所在的嶺上低了一千六百多公尺，那要比站在泰山上看汶河，還要高出二百公尺左右。實際上他立足點和江面的距離約有二十多公里，自南而北坡度約百分之六。但是他所看到的金沙江，只是一道道的深溝狹谷，兩側峭壁巉岩，宛如刀切斧劈，全是些紅綠相間的砂岩，與赭黃色的江水兩相映照，景色之瑰麗雄渾，得未曾有，難怪他後來提起要歡聲大叫：

「真是奇觀！」

生平大願獲償，心嚮往之的金沙江終獲一見，但是丁文江這一次探險旅行，他所付出的心力和代價實在是相當重大的。他在十里百里不見人煙的深山大谷，羊腸鳥道上，每天從天亮走到天黑，一路上還得測量、調查礦物、地形與地質，他見到徐霞客所不曾見過的景色，做了徐霞客所無法做的工作，他這一次萬里跋涉，對於

國家民族，確有莫大的貢獻。

通常他都是餐風宿露，隨處打尖，天一亮他就起身吃早飯，爲了節省時間，能走更多的地方，做更多的工作，每一分秒他都要確切把握。丁文江獨自一人，帶了一名嚮導，一名揹用具的伙子，和八匹騾馬、八名騾馬夫，馱着他的帳篷、鋪蓋、衣物、用具，書籍與沿途採集的標本。他等不及騾馬伏慢吞吞的收拾，天天都帶着嚮導、伙子先動身，讓那些騾馬裝載好後在中午前後跟上來。會合後一道吃中飯，再決定夜晚住宿的地點。這時候他又讓騾馬跟伙子先走，等他晚間去會合時，帳篷搭好，晚飯也燒好了，他一到就有熱飯可以下肚。

從那座大嶺下來，行行重行行，到五月二十日，丁文江方始抵達西康、雲南交界處的金江驛，當地下午的溫度是攝氏三十七度半，比人的體溫還要高。天氣實在太熱，所以太陽一落山，丁文江就跑到金沙江邊，脫完衣服，浸在水裏。——有人脫了衣服下水的消息迅即傳遍全村。不一會兒，一村子的男女老少全都跑到江邊去看「稀罕事」。丁文江還滿不在乎，但是當天晚上他就聽到他的居停主人在議論紛紛：

「江水裏哪個可以洗澡，他也不怕招涼了？」

「這位委員真自在啊，當着那麼些人，脫了衣服就下水，也不怕人笑話！」

過金沙江，他曾經到過雲南北部的最高峯，海拔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的古牛寨。從古牛寨上俯瞰金沙江東岸的重要支流之一——小江，兩地相距不及十公里，但是古牛寨要高出小江三千公尺，從而丁文江有了很重要的一大發現：古牛寨和小江間是中國最深的峽谷，比美國天下聞名的科羅拉多大峽谷 (Grand Canyon)，更要深一千三百多公尺！

古牛寨在東川(會澤)縣境內，丁文江是在視察了四大銅鑛的最後一鑛廠，巧家縣的湯丹銅鑛——那座銅鑛是雍正四年開設的，附有五家「子廠」，在轉赴東川途中，特意捨大路不由，繞道上古牛寨的。他從中廠口

渡過小江，到大寨，從大寨向正東方走十公里稍多一點，可以直抵古牛寨的極峯，但是這十公里多的路全是懸崖絕壁，所以整整要走上一天半。走到最後的一段，是火山岩所成的絕壁，坡度高達百分之四十九，根本就無法攀援，丁文江和他那位大無畏的嚮導，只好手足並用，走「之」字形的儘量斜着爬登，及登攀上高峯，發現古牛寨是一個直徑五百公尺的圓丘，最高點在偏西處，俯望所來徑，他便發現了此一中國第一大峽谷，同時，這也是他一生中在中國所曾攀登的最高山峯。

丁文江在民國三年六月十九日，向海拔三千公尺，金沙江西岸第一道高山——魯南山邁步前進，六月二十日下山，抵達雲南巧家縣岔河，岔河是夾在望鄉臺和大銀廠兩道大山之間的一座峽谷。他曾在望鄉臺，大銀廠的山頂測量地形，再從鐵廠通過大麥地小路抵達鹽井。在大麥地山巔，他看到了天下奇觀。

從鐵廠攀登大麥地山，上坡路九百公尺，從大麥地山巔到鹽井，下坡路就要兩千公尺了。這將近三公里路，由於路途之險難於上青天，居然要走兩天之久。丁文江一行抵達大麥地山巔時天還沒黑，在山巔可以望得很遠。向東面望得見金沙江，距山巔深達二千二百公尺。他居然望見了江心中聞名的將軍石和江心石，金沙江邊，蔥蘢的樹木夾雜着灰色的石頭，再往上一層，又是不見樹木的紅綠色山岩，在相距兩千公尺的對岸，岩石又一變而為黃色，赭黃的金沙江水在一道狹槽裏流，兩側全是一千多公尺的峭壁，他終於發現了這一處「天下奇觀」！

六月二十七日丁文江從鹽井渡過金沙江，考察舊東川府屬的四大著名銅廠，這四大名廠分別設在大水、落雪、茂麓和湯丹。他在這些產銅地區調查了十二天，因為要看看大雪山，所以他捨近而求遠，不走平路而走山路。由大水向西，爬上二千九百公尺的高坡，那正是大雪山的最東北部，然後再上坡三次下坡三次，方始抵達茂麓，再沿着大雪山的北邊走，——這一條路，又是丁文江的一大發現：「普天之下最難走的路」，——有一

段高坡全長二千九百公尺，坡勢奇陡，山徑奇窄，一經雨後又是奇滑無比。因而被丁文江發現了其險巖的程度，遠勝李太白所詠歎的蜀道。

明代雲南詩人唐泰，贈徐霞客詩中的兩句：「閉門不管鄉鄰鬪，夜話翻來祇有山」，移贈給民國三年二度入滇康的丁文江，毋寧更為貼切，因為，丁文江自民國三年二月，再入雲南，以迄四年返抵北平，他在雲南、西康兩省萬山千壑中期年，居然連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都毫無所知，祇是在三年九月自宣威至霑益道上，路上遇見一羣鴉衣百結的難民，內中有人認識他，攀談之下，方知他們都是箇舊錫礦的砂丁（礦工），當時有人向他訴苦說：

「外國人打起仗來了，大錫賣不掉，好多廠家都歇了工啦！」

他還鬧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直到雲南省城看見了報紙，方知世界大戰業已爆發。

最洋化的大旅行家

丁文江披草斬棘，深入不毛，受常人所不能受的罪，喫常人所不能吃的苦，走天下最難走的路，——須知道，在當年，他却是所有留洋學生之中，生活最洋化，最規律，最難更改的一位。而且這一點是他同期人物所一致公認的，因為他實足年齡十五歲就遠赴英國，一住就是七年，他的少青年時期大都在英國渡過，所以他受約翰牛的生活習慣影響很深，他有約翰牛的固執脾氣，也像約翰牛般的重享受，講衛生，守規矩。他有許多一成不改的生活習慣，在當年時常被引人引為笑談。例如他不喝酒，但在他和朋友們飲宴的時候，朋友喝酒他就用酒洗碗筷杯盤，朋友說不行，你這樣太浪費了，他也得先喊茶房端一碗開水來，親自把食具一一邊過再用。又如他喫水果一定要削皮，削完了皮還要在開水裏燙上二十秒鐘，一年一度，尤有易地避暑之舉。

一輩子最信西醫，但凡西醫有命，他無不樂從。他早年患有香港腳，西醫說唯有赤腳透空氣最有效，丁文江就終其生都穿縷孔皮鞋或涼鞋，在家乾脆光腳丫子，而自稱爲「赤腳大仙」。再如他抽了二十年的雪茄，死前一年他因腳指有點發麻而去看醫生，醫生說你得戒煙，他立刻就把手煙戒了。

由於太相信西醫，而又擇善固執過了度，曾有一次，白白斷送他一名從人的一條性命。就在他首度入滇過黔之際，在貴州內地他和他的從人全都生了病，他拒絕請中醫，寧願打電報到貴陽請西醫來診斷，他堅持要等貴陽的西醫到了他才肯吃藥。丁文江畢竟命大，他能拖到貴陽的西醫翻山越嶺，兼程趕來，他的一名從人却救治不及，一命嗚呼。這位全盤歐化了的中國學者，雖然他也曾多年從政，在軍閥時期當到炙手可熱的淞滬總辦，他却一向有四大恨，一大忌。所謂四大恨是一恨說謊，二恨懶惰，三恨舉債，四恨貪污。一大忌是絕對不吃海鮮，胡適曾經問過他何以故，不吃海鮮是否也有科學根據？他的回答是不吃就是不吃。

丁文江的四大恨之一，恨貪污。他所云的貪污除了貪贓枉法，化公爲私，還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介紹信和利用公家免費來作私人旅行。他自詡平生不欠人家一文錢的債，甚至連文字債、信債也絕對不欠，蔡元培曾推許他「案無留牘」，他平素寫信最勤，有信必覆。有一次他看到胡適桌上未覆的信堆積如山，當時他就毫無保留的批評胡適說：

「我寫一封信平均只要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是朋友們都接到了我的回信。你寫一封信起碼要半個鐘頭，結果反而落得沒有功夫寫。」

在他的友好之中，曾經當過北政府司法總長，一度鬧出金佛郎案掀起軒然大波的羅文幹，是富家子弟出身，他時常笑丁文江「寒儉」，理由是他看錢太重。譬如朋友們在一齊打麻將，丁文江只要得了一手好牌，他準定會手心裏出汗，因此朋友們常取笑他道：

「要曉得丁文江的牌好不好？只要摸一摸他的手掌心好了。」

富家子弟出身的北政府司法總長羅文幹，時常取笑丁文江「寒儉」，但是胡適却認為丁文江並非寒儉，而是他處處小心謹慎，他花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他才能够終身不欠債，因而保有獨立清白之身。丁文江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胡適曾經指出這正是他嚴格的科學化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胡適還曾自疚的說：「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濶少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不過，胡適又說過：「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

這一點，固然是胡適有所據而發，他所根據的是民國十一年，丁文江以「宗淹」的筆名，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容即在他提出將來如若過政治生活，所應有的幾種預備，歸納起來，約可以分爲下列的四項：

一、保持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說，乃在切勿「作爲無益」，積極言之，則躬行克己，尤須以「責人必先責己」爲前提。

二、要做有職業的人，並須增加職業上之能力。

三、設法勿使生活水準提高。

四、就所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乃至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準備。

祇是，以丁文江平素的言行，覆按其一生的「政治生活」，胡適所謂之「小心謹慎」，很可能會反證丁文江是在「但見其小，忽焉其大」了。如所週知，一個人立身處世，首重出處。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漢蔡中郎薦皇甫規文尤謂：「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儼然不污」。由而可知出處的最低限度行爲標準，必須是「抱義而行」。好了，再讓我們以此古今猶仍的標準來衡量丁文江的政治生活。丁文江之與國

內政治人物結緣，頭一個就是他自小仰慕的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以康梁並稱的保皇要人梁啓超。

梁啓超稱之為本師

丁文江十五歲（實足年齡方祇十四）東渡日本，他每期必讀梁啓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而且還在看過以後付郵寄回國內，寄給他的大哥閱讀，可是，當時梁啓超正在東京，他却無緣一觀韓荊州，似乎他也並不積極的作此想，一直到民國七年，梁啓超假雲南首義之餘威，在段祺瑞內閣中當了四個半月的財政總長以後，終於鬧得頭痛欲裂，刺激太過，不得已而辭職。自此開始籌劃出洋游歷，七年十月十日袁世凱的老朋友徐世昌出任北政府大總統，十二月初，梁啓超管京與徐大總統接洽多次，並與駐京各國公使週旋一切。梁啓超以個人資格前赴歐洲的事方告確定。究竟是怎麼樣才確定了的呢？梁啓超在寫給他長女梁思順的信裏說：「經費殊不充，公家所給僅六萬，朋舊餽贈約四萬耳」，此即謂，梁啓超在用公家的錢在作私人旅行。因為他在這封給他愛女的信中居然強調：「此行全以私人資格，不負直接責任。」

梁啓超獲得北洋大總統徐世昌的敷衍羈縻，免得他在北洋軍閥大分裂下趁直皖兩系對立鬭爭之際而推波助瀾，鬧成天下大亂，方始忍痛從公庫提出六萬大洋，再致私人程儀，請翻手爲雲覆手雨的梁啓超，早日出國遠行。梁啓超乃命他的友好門生故吏蔣百里（方震）、張君勱、劉子楷三人同行，復聘滬上金融鉅子徐新六（振飛）爲財政經濟顧問，實則爲經費上的後臺老關，復以楊鼎甫（維新）擔任錄事兼私人僕役。梁啓超想來想去，他隨行人員的名單內，財政、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各方面的人才應有盡有，獨獨少了一位科學專家。梁啓超不由不想到一項嚴重的後果，假如獨缺這位科學專家的話，又怎能對現代的歐洲，有澈底的認識？

徐新六和丁文江曾是留英同學，素來相交莫逆，互有瞭解，當徐新六聽說梁啓超就祇缺乏這一方面的人才

，他馬上就想到了丁文江，於是鄭重其事，語多溢美的向梁啓超推介。丁文江自小仰慕梁啓超，這還是他們第一次正式見面。

梁啓超、蔣百里、丁文江一行七人，是在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三自北京啓程赴歐的，經過天津一宿，二十六日抵南京，在馮國璋的督軍衙門吃過午飯，便乘車往上海。二十七日晚上，一行七人和進步黨的要角張東蓀、黃溯初（羣），整整談了一個通宵，所得的結論是：「着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梁啓超並且聲言：「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因此梁啓超公開發表他們此行的目的，要言之爲以下兩點：一、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

二、由於認爲巴黎和會眞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下永久的和平基礎，想以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的力量。

字裏行間，並無一語隻字言及於公，但是，梁啓超一行旅費的大半，顯然出之於公幣。這種行爲，比丁文江所恨的「拿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情節還要嚴重得多。我們不能想像歐化程度如此其深，一生小心翼翼的丁文江，會不知道此行經費之來源，這便是他未能從大處着眼堅持其原則處。固然是梁啓超拿的錢，然而丁文江終不能否認他不在花錢之列。

丁文江隨梁啓超一行旅歐，除了以科學專家的身份，擔任梁啓超的顧問之外，他既與徐新六打前站于先，又教授梁啓超唸英文，並爲他擔任翻譯於後，梁啓超在給他弟弟梁啓勳的信中曾經承認了文江是他的英文老師，尙且以「本師」相稱，他在那封信裏說：

「此行若通歐語，所獲奚啻十倍？前此蹉跎，雖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補牢計耳。故每日所有空隙，盡舉以

學英文，雖甚燥苦，然本師（原注：丁在君）獎其進步神速，故興益不衰。」

梁任公其有厚望焉

丁文江素性憨直，常以至性至情人，對於「德高望重，著述極豐」的梁啓超，自亦未能例外，他在梁啓超跟前，有問必答，從無隱諱。梁啓超曾經問起他：——「予何人也？」丁文江的回答則是非常直率的下個結論，他說：

「任公先生個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難做一個好政治家。因為在政治上，必須時時具有一個冷靜的頭腦，方始不致誤事。」

於是梁啓超又問：

「那麼，你認爲我做什麼工作比較相宜呢？」

丁文江侃侃答道：

「我發現先生的分析能力極強，如果能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我以爲先生應該放棄政治活動，從事學術研究。」

當時，梁啓超表示丁文江的意見很對，而丁文江也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名青年後輩，居然能够使譽滿中外的大家物，在他春秋鼎盛時期（當年梁啓超祇有四十六歲），居然能聽從他的忠告，翻然改圖，轉換了一生的方向，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此，他非常熱心的爲梁啓超搜集了好些研究史學的英文書籍，譯給他聽。梁啓超在史學方面的若干重要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新史學」、「史學之世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係」等，正是如此這般得來的。梁啓超對於近代史學和傳記學的卓越貢獻，丁文江在幕後實與有力焉。

民國九年三月五日，梁啓超漫遊歐美歸來，丁文江則先已返國，回國後的梁啓超，除了對山東問題發表個人意見，晉謁北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報告歐遊經過，一度致書徐世昌，請他釋放因八年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他果然遵守他和丁文江的前約，不談政治。在他寫給女兒思順的家書中還會說過：

「……滬上政客未接一人，最爲快事。……以二十九日入都（按指北京），與當道循例一週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諸友共作飲食宴樂外，一切酬應皆謝絕。東海（指徐世昌）約宴亦謝之。」

凡此口脛，跟曩昔重排場，好熱鬧，輒與當時權要交接極歡的梁任公，簡直判若二人。民國九年一年之間，梁啓超一面埋首著述，一面着手創辦事業。他所計劃要辦的事計有發起中比公司、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成立講學社、整頓改造雜誌、發起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等項，够他忙的了。一時之間，國人盡知梁啓超走向學術研究的老路，他很顯然的表示他將與政治絕緣。

丁文江則在返國以後仍然當他的地質調查所所長，梁啓超要辦那麼許多的事業，當然需要相當可觀的經費，在籌募基金方面，他確曾打過丁文江的主意，想從他的身上覓獲可觀的財源。這一點，他也曾在他的家書中很明顯的透露過他內心的計劃，梁啓超說：

「前隨我遊歐之丁文江任地質調查所所長多年，中國何處有佳礦，應如何辦法？情形極熟，但吾輩既無資本，只得秘之，以俟將來耳。」

由而可見，梁啓超是以丁文江爲對外秘而不宣的一宗瑰寶，未來之大發開礦之財，端在此君身上。殊不料，丁文江是學人，地質調查所是國家的調查機構。他本人全無發財興趣，而且也不想利用調查所得幫人家發財致富。丁文江在地質調查所前後將近二十年間，他的足迹遍及全國各地，他所發現的礦脈，和各地地質狀況，全都作了公開而詳盡的報告，丁文江爲國家留下了無數的報告、紀錄與圖件，數以噸計的化石和標本。例如

民國二十三年間他曾兩度深入康滇，研究東川、會理之銅鑛、簡舊之錫鑛、宣威之煤鑛，二年又赴井陘、娘子關、平定一帶考察煤田、鐵鑛並研究地質，再轉赴河北、河南交界之磁縣、六河溝探勘煤田性質。此外如南京山地、蘇皖浙三省界上、山西三門、蔚縣、廣靈、陽原之煤田、宣化、龍關、大同、北票、鶴立岡、山東中興煤礦、湖南萍鄉、湘潭、耒陽之煤田，廣西南丹、河池之錫鑛，遷江之煤田，馬平之石灰岩、貴州全境之探勘旅行，他都留有寶貴的紀錄，顯然他是孜孜矻矻於調查開發國家之富源，他不曾計及親友和個人的發財問題。

但是梁啓超對於丁文江手中所掌握的莫大財源，却是處心積慮，頗有野心的。問題在於，果然有這麼一天，梁啓超得了一筆足夠的資本，可以開那一本萬利的鑛，以梁啓超辦事業需要經費之殷急，這些事業又頗爲丁文江所贊許，所樂觀厥成，以及梁、丁之間友誼的密切，那麼，丁文江會不會如梁啓超之所願，在職務範圍之內給他若干暗示或方便？這一回事相當的耐人尋味，因爲丁文江果若如此，那不但將成爲他一生的白璧之玷，同時就法律而言，他也難辭「洩露業務上之機密，圖利他人」的刑責。

丁文江甘於暫時拋下他方自一手建立的地質調查所，和許多重要而亟於進行的地質調查工作，跟梁啓超跑了一趟歐洲，充翻譯，當私人教師，除了自幼仰慕，夤緣識荆的一點感情作用，在他來說確是得不償失。自保皇黨以迄進步黨的種種作爲，丁文江如非居心偏頗，他應該不難看出康有爲、梁啓超那一幫人的行迹。康有爲不但搞政治每每昨是而今非，朝秦暮楚，敵友不分，尙且對於歛財之道也是不擇手段，唯利是圖，廣東人所謂之「撈家」也。跟梁啓超之輩相交結，以丁文江的書生脾氣，結果居然沒有受到譏評，還得算是他的運氣。事實上，梁啓超垂涎開鑛獲大利，幾幾乎乎就找到了一位姓林的華僑主顧，那是由他做外交官旅居海外的女婿、女兒所介紹，梁啓超曾在致女函中說：

「茲有寄林某一信，並中國公學紀念印刷品兩冊（原注：胡適之即在本公學出身者，同學錄中有名），可

交去，並極力鼓起熱心，若彼能捐五十萬，則我向別方面籌捐更易，吾將以此爲終身事業，必能大有造於中國。彼若捐巨款，自必請彼加入董事，自無待言，此外當更用種種方法爲之表彰名譽，且令將來學生永久念彼也。汝前信言彼欲回國辦礦，若果有此意，吾能與以種種利便。……」

利便何在？當然在於丁文江千里跋涉，深入不毛所獲致的寶貴資料。以上所錄的信中一段，寥寥一二百言，可見梁啓超這位撈家是如何的善於利用親友和各方面的關係。誠可謂：老喫老做，自然當行出色。

董顯光說他是幹才

民國十一二年間，丁文江在北票煤礦公司任總工程師，董顯光先生在華北水利委員會服務，並且兼任密勒氏評論報駐華北副主筆。兩位好友的家都住在北京，工作地點則在天津。董顯光在天津前意租界三馬路十三號租了一個通樓作爲下榻之處，他邀丁文江和他同住，把通樓隔爲前後兩間，丁文江在前而董顯光居後，照拂他們的是華北水利委員會一名工友，兩位先生在住處只吃早晚兩餐，飲食非常簡單，通常都是一菜一飯，因爲丁文江喜歡吃黃豆燒肉，幾乎不可一日無此君，於是那道黃豆燒肉就成了他們整整喫了一年的唯一菜餚。

丁文江和董顯光一樣，不愛看電影，不喜無謂的交際應酬，他們同居居住相處一年之久，但是因爲雙方的工作都很忙碌，公餘之暇則丁文江潛心中西典籍，董顯光忙於埋首著述，兩個人唯有利用吃早、晚飯的時候略爲交談，或者特地抽空來長談一次。

董顯光說丁文江的中文、英文和德文的造詣都「極深」，治學的範圍又「極廣」，因此他通曉天文地理之外，對於政治也有很濃厚的興趣。他說他曾看見丁文江在從事過去五百年間中國宰相的籍貫考據，他甚至於寫成了一本書，書中的結論是根據統計，前五百年間的中國宰相，以南方人居多，而在南方人中又以蘇北人居多。

數。當時董顯光覺得丁文江既然是一位地質學者，又何必以其有用的時間來做這種無關緊要的研究，所以曾有一天他勸丁文江說：你與其研究前五百年間中國歷朝宰相的籍貫，還不如利用空餘的時間去找金鑛、銀鑛。

當下丁文江便回答他說：

「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質。如果我找到金鑛銀鑛，而不了解人事問題，那金銀仍將被偷盜以去，弄得更糟。」

董顯光不失為一位目光敏銳的觀察家，丁文江確實對於政治有着非常、非常濃厚的興趣，這一點是在學術界的任何好友都無法為之否認的。胡適也曾說過：

「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不過癥結在於丁文江僅祇是有自信、有把握、有信心，他能搞政治——改良政治，並且他堅信如果政治不良，那麼一切實業、教育全都辦不好。但是，他卻始終不曾提出過什麼改良政治的主張。民國十二年他作過一次「少數人的責任」的演講，一開頭就一針見血的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更強調的說：

「只要用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智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但是他又有一句口號：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丁文江所謂的「放火」，直指「使用暴力的革命」，因為一旦放起了火來，總難免會有乘火打劫的人。所以他的政治信念乃在於他的本身，以及像他那樣「有道德」「有智識」的人，不管當權者是武人、是軍閥、是政客、是國民公敵，只要能夠參加，而發揮其「改良作用」就好。像這樣全無主張的「改良主義」論調，和梁啟超的自保皇而立憲，而護國而終至焦頭爛額，不得不宣佈暫時退出政壇，其實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兩者距離極為有限，難怪丁文江一參與政治，立刻就惹火燒身了。

研究前五百年中國宰相籍貫的那一本書，後來始終不見出版。——董顯光及後回想，他那本著作旨在研究地理與人事的關係，其實確是有它的價值的，董顯光頗以其未能問世為憾。

跟張君勱一場筆戰

十二年春夏之交，梁啟超的兩位好朋友，丁文江和張君勱，因為人生觀的論爭，發起極劇烈的科學與玄學之筆戰，引起國內外學術界人士一致的重視，至今猶被譽為影響我國近代學術思想既深且鉅的論戰之一。雙方交手之初，丁文江一開頭就表示他決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的「精神文明」，他要打倒「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下的精神文明論。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二日，他在「努力週報」第四十九、五十兩期連續發表「玄學與科學」，像在中國學術界平靜無波的湖面投下了一方巨石，立刻掀起軒然大波。他闡明他理想中科學訓練的人生觀，簡而言之，略如以下所引之一段：

「科學，……是教育同教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的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思想，而想象力愈增；用經驗來指使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瞭然於宇宙生物心理

種種的關係，才能够眞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得透澈，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丁文江坦率的表白，他不佩服張君勳所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他所用的文字十分精闢犀利，例如他套顧亭林（炎武）的口脛痛罵當時的玄學崇拜者流，就曾這麼直截了當的說：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

丁文江以科學界的聖人達爾文、護法赫胥黎、名將蓋爾頓 (Francis Galton) 爲堅強有力的背景，對擁護玄學者大肆撻伐，一連寫了「玄學與科學」、「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勳」、「玄學與科學的討論與餘興」三篇文章，都發表在努力週報。當時羅家倫先生在美留學，讀了他的這些篇章以後，盛讚其：「……思想之清晰，筆鋒之犀利，字句的謹嚴，頗有所向無敵之概。」而時在巴黎求學的傅斯年先生也說：

「在君（丁文江）必是一個深刻的受赫胥黎影響者（嚴復並不是），他也在中國以他的科學、玄學戰做成赫胥黎（只可惜對方太不行了）。」

大概是素來跟寶山張家兩位賢昆仲——張君勳和張嘉璈關係太密切了的梁啓超（有謂梁啓超和張君勳拜過把），眼看着「對方太不行了」，於是乃在養病翠微山期中，力疾而起寫了關於玄學、科學論戰的「戰時國際公法」，「人生觀與科學」兩篇文章，表面上說是唯恐丁文江、張君勳過用意氣反傷和氣，因而由他來導入爲眞理而論戰的途徑，但是他在這兩篇文章裏畢竟也說明了他個人對玄學和科學的態度。梁啓超說：

「人類生活固然離不了理智，但不能說理智包括盡人類生活的全內容。此外還有一極重要部份——或者可

以說是生命的原動力，就是感情。」

梁啓超尤其在第二篇「人生觀與科學」中，對玄學、科學論戰作了一個結論：

「我把我極粗淺、極凡庸的意見總括起來，是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涉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丁文江和董顯光在天津稅屋而住將近一年，有時候兩位好友也會抽暇談談問題，每當丁文江向董顯光娓娓細訴他的讀書心得，董顯光很佩服他的博學多聞，偶然言志，董顯光常說他想辦一份中文報紙，丁文江聽後極表贊許，一再的鼓勵董顯光說辦就辦。——他在朋友之間向以熱心誠懇，願予並且善於爲朋友安排諸事而著名，因而朋友習於稱他「丁大哥」，以示親暱，——祇是當年想憑個人之力辦一份報紙實在不太簡單，因此儘管丁文江慫恿甚力，董顯光的願望還是遲遲不曾實現，這一來反倒成了個「皇帝不急，急煞太監」之局，有一天丁文江居然用上了激將法，他「責問」董顯光道：

「你的報紙如果再不辦出來，那就是你沒有出息！」

「沒有出息」這四個字實嫌不當，份量太重了些，但是，董顯光深知丁文江出自一片衷誠，爲了不辜負好友的盛情與期望，他毅然決然盡出數年積蓄數千銀元，買了幾部舊印刷機和全部鉛字，辦起當年也曾享譽一時的「庸報」。「庸報」問世，董顯光順理成章的請丁文江撰寫社論，丁文江立即欣然接受邀約。

一度失足淞滬總辦

「一生小心謹慎」如丁文江，平生第二件未能顧全大節出處的是他曾依附北洋軍閥孫傳芳，當了一年多全國第一肥缺的「淞滬商務總辦」。關於這一件事，胡適也說：「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

的政治生活」，傅斯年曾爲他解釋的說：

「他在淞滬任中，爲後來之上海特別市建造弘大的規模，只可惜後來人並不能步趨他。他除了好些積弊，他從外國人手中爭回重大的權利，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這些權利的外國人，反而能够誠意的佩服他！雖然他當時的上司是孫傳芳，然而他並不是孫傳芳的私人，他仍是爲中華民國服務。後來孫傳芳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時，他並沒有跟他。」

傅斯年先生爲知己好友挺身而辯的熱情，具見前輩風範，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不過，無論如何，他說話有點勉強。這是明眼人一望可知的事實，何況，卽連傅先生自己也並不否認，爲了文江之投孫，當年還有一段極精彩的故事。

民國十二年四月丁文江和張君勸開玄學與科學論爭的筆戰，傅斯年在海外讀到丁文江的文章，大爲傾倒。從此心目之中有了丁文江這樣一位人物，可是十五年初丁文江應孫傳芳之邀出任淞滬商務總辦，傅斯年在英國得了這個消息，不禁大爲憤慨，他深以爲像丁文江這等人才，他爲什麼要仕於錢鏐之朝（錢鏐微時販鹽爲盜，後唐乾符年間經鎮將董昌表爲偏將，敗王郢，破黃巢，平劉漢宏，拜鎮海軍節度使，又平董昌之叛，天復間封越王，天祐初封吳王。梁太祖卽位復封吳越王。終自稱吳越國王，居臨安故里卽今之杭州，在位四十一年），以堂堂正正的名學人，去跟呂惠卿一輩人物來往（呂惠卿字吉甫，被王安石薦爲太子中允，事無大小，必與謀，曾預王安石頒行新法事。安石旣敗，呂惠卿驟致執政，深忌安石復來，凡可以阻安石者，無所不爲，安石深悔爲其所誤，旋罷相，出判江寧府，當政者咸惡其爲人，無敢引入者，以是轉徙外服而卒。傅斯年以呂惠卿隱指孫傳芳，可能鑒於孫傳芳之爲吳佩孚一手提拔，而後竟坐看吳氏覆亡）。因此，他對丁文江的一片仰慕，便一變而爲深惡痛絕，快人快語如傅斯年，當時就憤憤然的揚言：

「將來我回國，第一件事就是殺了那丁文江！」

話講過了，時日一久，也就忘諸腦後。傅斯年回國了，他在民國十八年初夏和丁文江初度會晤，照他自己的說法是：「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就在丁傅由好朋友變成極好的朋友那一階段，民國二十年春天，傅斯年請了幾位朋友在家裏喫飯，丁文江和胡適也在座，席間，傅斯年議論風生，他談起了某位熟人，對他頗有非議。胡適則批評他的論調不公平，兩位好友終於抬起了槓子，胡適便直率的問傅斯年說：

「你這種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不記得你在巴黎的時候，曾經一連向我講過三遍，你回國的第一件事就是殺了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就在你旁邊，你幹嘛不殺他呀！」

舊話重提，當着丁文江的面兜了出來，難免使傅斯年大窘，後來他再遇見胡適，當面埋怨他那天晚上太惡作劇。胡適卻嘻笑怒罵的說：

「你放心好了，在君聽了你那個話，不但不會生氣，反而還會高興哩！他能把你這位殺人犯變成朋友，豈不大可自豪？」

跟梁啟超素來接近的若干人物，當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萬民囑望全國統一迅將實現之前夕，突然投入軍閥陣營，甘爲禍國殃民之北洋軍閥虎伥，有許多蛛絲馬跡，推究得出來很可能是梁啟超暗中操縱，而由蔣百里出之以首倡。曾經力勸梁啟超不問政治，致力於學術研究的丁文江，他也捲進了漩渦，或爲他過於自信有「改良政治」的能力。

投靠軍閥大有內幕

當時正有鼓盆之痛，爲原配夫人營葬，自己又因便血而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的梁啓超，他在他的致兒女家書中迭曾提過：

「……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我病全好之後，對於政治不能不痛發言論了。」（十五年九月四日）。

「時局變化極劇，百里所處地位極困難，又極重要，他最得力的幾個學生都在南邊，而孫傳芳又卑禮厚幣要仗他做握鵝毛扇的人。但北伐軍入江西，孫爲自衛，不得不決裂。我們的熟人如丁在君、張君勸、劉厚生都在孫幕，參與密勿，他們都主戰，百里亦不能立異，現在他已和孫同到前敵去了。老師打學生，豈非笑話（按指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長唐生智是保定一期的學生，當時蔣百里正任校長），好在唐生智所當的是吳佩孚方面，孫軍當面接觸的是北伐軍。這幾天江西的戰爭關係真重大，若孫敗以後，……（原注：百里當然跟着毀了。）若孫勝北伐軍敗，以後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計劃是要把北伐軍與唐生智分開，北伐軍敗後，謀孫、唐聯和，果能辦到此著，便當開一嶄新局面。國事大有可爲，不能不付諸氣數了。」（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給孩子們的信）。

「時局變遷非常劇烈，百里聯絡孫（傳芳）唐（智生）計劃全歸失敗，北洋軍閥確已到末日了，將此麻木不仁的狀態打破，總是好的，但將來起的變症如何，現在真不敢說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給孩子們的書）。

「思永（梁啓超的兒子）問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孫傳芳那邊？這話很難說，內中關係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蔣百里二人。他們與孫的關係都在一年前，當時並沒有孫和北伐軍對抗的局面，孫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也總算比較清明。他們與孫合作並不算無理由。既已與人發生關係，到吃緊的時候舍之而去

，是不作興的。直到最近兩個月，孫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結二張（張作霖與張宗昌），和丁、蔣等意見大相反，他們方能老實實的和他們（孫傳芳）脫離關係。中間這一段誠然是萬分不值（原注：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然在一年前他們的夢想原也很難怪。（原注：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辦一較良的市政，以漸進手段收回租界。）至於我呢，原來不甚贊成他們這類行動（原注：近數月來屢次勸他們自拔），但我們沒有團體的嚴整組織，朋友們總是自由活動，各行其是，亦沒有法子去部勒他們（原注：也從未作此想），別人看見我們的朋友關係，便認為黨派關係，把個人行動認為黨派行動，既無從辯白，抑亦不欲辯白。我之代人受過，總是免不了的（原注：亦自甘心）。」（十六年一月十八、二十五日，給孩子們們書。）

作孫傳芳後方重鎮

「我在今日若選不理會政治，實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不過出面打起旗幟，時機還早，只有秘密預備。」（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給孩子們們書。）

梁啟超在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將成的一段期間，他對於丁文江、蔣百里投效孫傳芳一事，其因局勢之演變，歷次所作不同之反應與所持之態度，略如以上所摘信函原文。以下還得錄一段蔣百里在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致任師書，他在信中報告梁啟超說：

「在漢上托翊唐帶奉一槓，想蒙入鑒。到滬由溯初（黃羣）處得讀手示，知（以下述梁啟超之病況）……，至為懸念。天如（唐天如，曾在吳佩孚幕中任要角）特因此北行，想日內當可到京，君勸想當先到矣。……季常（蹇季常，貴州人，梁啟超之頭號智囊）尚在南京，約月杪歸京。……在君（丁文江）在滬忙極，在短時期內總可安定。……漢孫日內仍歸漢，以搏沙有事相需也。」

就這麼短短的一段，可以令人很明顯的看出，梁啓超的那些「自由活動」的朋友，爲了「謀孫傳芳、唐生智之聯和，開一嶄新局面」，幾乎是精銳盡出，其志當然不小。譬如以蔣百里去吸收他的學生唐生智，以丁文江爲孫傳芳的後方重鎮，飛芻輓粟，而以丁文江與上海大老陳陶遺、浙江省長陳儀組爲三人聯合陣線，企圖左右孫傳芳，益之以張君勱之僕僕京滬，唐天如之往返聯絡，黃羣坐鎮上海，蹇季常位置南京孫傳芳總部，又有翊唐、藻孫、搏沙之參與密勿，擔任聯絡，梁啓超拿出來的這個陣營還算小嗎？還有蔣百里這封信上所未能一一提到的，更多的「自由活動的朋友哩。」筆者提出此強有力的證據，即在於說明了文江之突然「熱心政治」，爲北洋軍閥孫傳芳效力，決不是單獨的，自由的行動而已。

倘如再看梁啓超自十五年九月四日，到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幾封家書摘語，梁啓超之爲此一軍閥政客結合事件之發踪指示，幕後操縱者，可以說是昭然若揭，無從遁形。十五年九月四日他躊躇滿志的說：「我病全好之後，對於政治不能不痛發言論了。」二十七日又詳述其謀孫唐聯和，開新局面的計劃，而馨香禱祝，將「國事大有可爲」，「不能不付諸氣數」。十二月二十日直承蔣百里聯絡孫唐的計劃全盤失敗。十六年元月十八及二十五日函中即談之此事爲蔣百里、丁文江等之自由行動，他亦「甘心」代人受過。一月二十七日又再作宣言，梁啓超要秘密預備來日再舉。那正是保皇餘孽，進步黨人在國民革命的大纛之下全盤失敗。

傅斯年說要殺了他

就在丁文江聽到胡適提起傅斯年爲他屈身事賊，氣得宣稱要殺了他的話之後不久，他曾「常常」向傅斯年解釋那一回事的動機和下臺情景。他說他當時的目的在於——丁文江認爲改良中國的政治（其實充其量只能說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時便「機不可失」。同時，他參加孫傳芳集團居然還是個三人團

，除他之外，還有陳陶遺和陳儀。

想當年，孫傳芳號稱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聲勢煊赫，氣焰薰天。孫傳芳字聲遠，因而部下尊稱馨帥。他是山東泰安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回國後在北洋新軍第二鎮（師）王占元部下充任低級軍官，民國成立後王占元得了湖北督軍的寶座，孫傳芳自此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由團長而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王占元貪財好貨，經常尅扣軍餉，民國十一年因官兵鬧餉而引起兵變，宜昌、武昌都受到亂兵的焚燒劫掠。當時唯有孫傳芳的部隊保持完整，不曾潰亂，這是他往後受知於吳佩孚的由來。

由於駐湖北的北洋軍兵變，加以王占元的多年橫征暴斂，大肆搜括久已爲鄂人所痛恨，湖北籍的軍政界人士蔣作賓、孔庚等爲解鄂人倒懸，聯絡湖南、四川兩省之軍，發起武力驅王運動，這便是民初歷史上的援鄂戰爭，王占元的殘餘北軍不堪一擊，久已垂涎武漢居天下之中的直魯豫巡閱副使吳佩孚，乃自洛陽大舉南下，擊敗湘川兩軍，從王占元手中取得湖北地盤，派其部將蕭耀南爲湖北督軍，吳佩孚再兼兩湖巡閱使。孫傳芳因爲在這次大變亂裏，始終能够確保自己的部隊，而且作戰極肯賣命，迭有良好的表現，因而獲得吳佩孚的賞識，收容他在孚威上將軍的麾下，尙且破格提拔，不次擢升。當到了第二師師長，兼長江上游總司令，以湖北宜昌爲其根據地，對吳佩孚唯命是從，執禮尤恭。

民國十一年四月第一次直奉之戰爆發，吳佩孚一舉擊敗張作霖，以曹錕、吳佩孚爲首之北洋直系，取得北政府控制權。十一年十月北洋皖系大將徐樹錚、粵軍許崇智聯絡旅長王永泉等逐走福建督軍李厚基，孫傳芳奉吳佩孚之命援閩，三月六日率部進抵福建延平，二十日底定全閩，孫傳芳也當上了福建督軍，漸次獲得了福建地盤。十三年九月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和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爲了搶奪上海這一隻金飯碗，而釀成了蘇浙之戰又有人謔稱爲「中國內部的鴉片之戰」，孫傳芳乘機奇襲杭州，逐退盧永祥而併吞浙江，由吳佩孚一

力保舉他爲浙閩巡閱使，兼浙江督軍。十三年九月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而敗，退往武漢，奉軍大舉南侵，分據江蘇、安徽。孫傳芳又得吳佩孚之助，兩路夾擊，驅逐奉軍，再利用皖贛鵝蚌相爭，漁人得利。到這時候，他已奄有蘇、浙、皖、贛、閩五省之地，而開府南京，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儼然以東南盟主自居。

民國十五年初，國民革命軍北伐雄師，業已席捲兩湖，進兵江西，和孫傳芳的東南軍閥勢力，發生直接衝突。丁文江就在這個時候，以丁文江、陳陶遺、陳儀三人團的姿態，出而爲孫傳芳之虎俵。三人之中，陳陶遺原名公瑤，字陶怡，號道一，又署劍虹，江蘇金山人，中國公學肄業，早年曾參加同盟會，當過同盟會江蘇支部長，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舉爲參議院副院長，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他曾避往東北，組織戊通航運公司。十五年投效孫傳芳，任江蘇省長。

丁文江和陳陶遺等參與孫傳芳的戎幕之初，他確實很想有一番作爲，他曾力邀正辦庸報頗有起色的董顯光，一道南下，出任上海交涉使。董顯光說他所辦的庸報方始有點頭緒，一旦遠離，事功即將半途而廢，他說他實在不想做官。可是丁文江仍然一力堅持，必欲董顯光到上海去走一趟，再從長計議。董顯光迫不得已，只好答應稍晚幾天再去。

丁文江抵滬就任新職，他和他的夫人住在「客利飯店」，正好胡適也住在「客利」，成了新任淞滬商埠督辦的芳隣。胡適見過丁文江貴爲總辦時的情景，他每天都要收到不少的荐書，他總是命一名書記把這些荐書分類，歸檔，然後在他需要某種人才時，再寫信通知合乎需要而又有荐書的約期前來考試，考試及格，概予錄用。否則，他也會一一知會原介紹人。

總辦迎賓進巡捕房

丁文江雖然得了全中國的第一「肥缺」，以堂堂淞滬商務總辦之尊，但是他兩夫妻却也能保持書生本色，決不踵事增華，鋪張排場。也許正因為總辦大人不講排場，太過於「寒儉」，所以，在董顯光如約而來，丁文江欣然往迎的那天，還鬧了個大笑話。

丁文江欣然往迎董顯光，他特地坐一輛借來的小轎車，當他接到了董顯光之後，轎車通過大英地界（上海的公共租界），不料車上的中國司機因為路徑不熟，走錯了路線，以致違反了交通規則，被一位印度籍的巡捕（由於他們頭纏紅布，上海人稱之為「紅頭阿三」）發覺，於是不由分說，將留英七年，進過劍橋和格拉斯哥兩所著名大學，擁有雙重學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重要客卿，第一紅員，新任淞滬商埠總辦的丁文江，連主帶客，外加司機，一齊捉進巡捕房去。

這位淞滬商埠總辦丁文江是一心洗滌國恥，以「漸進方式、溫和手段」收回租界的，他所迎來的好友董顯光；正是他寄望極殷，可以「幫助」他完成此一豐功偉業的上海交涉使預定人選。然而，他們兩人都因為司機不慎走錯路線，被帶到巡捕房任由巡捕老爺升堂問話。他居然就拿捕房巡捕和印度阿三毫無辦法，說起來這真是華裔子孫的奇恥大辱。後來，幸虧有一位英國警長認識丁文江，終於當堂釋放。

事後丁文江可能是為了聊以解嘲，他向董顯光大談特談其志願與抱負，他說他亟於謀求中國之統一，而只要中國真能統一了，中國官員的地位自將水漲船高，從此再也不會受辱於大英捕房、印度阿三的情事發生。從而丁文江又自承的說道，他對孫傳芳的期望很高，認為他是足可用兵力統一中國之人物。所以他強調今日之事何妨容忍，反正中國有了孫傳芳，也就等於有了新希望。這便是他投効孫傳芳最大原因之所在。

不要以爲丁文江無非一個書生，何況又是洋味最重的人，他對於中國的政治情況，軍事力量一無所知，因而才會對孫傳芳估價太高。相反的，他還是唯一心細如髮，利用科學方法精密核計各方力量的一人。蔣廷黻先生曾說丁文江是他「一生一世所遇見的最講究科學的一個人」，蔣廷黻在民國十四年的冬天初見丁文江，地點是在天津的一家飯館，丁文江是主客，陪客則都是南開大學的教授。至於主人，蔣廷黻已記不清楚了是南開礦科創辦人松祖紳，還是礦科主任薛桂輪？

主人介紹蔣廷黻和丁文江認識，他們相互握手。蔣廷黻記得丁文江所給予他的印象，首先是他那兩撇仁丹鬚，八字鬚的兩端微微上翹，其次是他的穿着，皮大衣上配有貂皮領，第三是丁文江那銳利逼人，白多於黑的目光，——關於這一點，胡適的記述份外生動逼真，胡適形容過了文江的眼睛，他很厚道的說：

「在君的爲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國維廉皇帝式的鬚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於不喜歡的人，總是斜着頭，從眼鏡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會對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

蔣廷黻很注意丁文江的一言一行，他發現他不喝、不鬧、也不大喜歡同席的人鬧酒。但是他一入席就先用紹興酒洗筷子，丁文江不講究吃，對主人所點的菜不加批評也從未稱讚，看起來他注意的祇是營養和衛生。席間，丁文江和主人先談起有關開礦的事，蔣廷黻不生興趣，也就沒仔細聽。可是後來話題一轉，轉到當年的內戰和北洋軍閥的部隊，他聽到了文江在談那些北洋軍閥的年齡、籍貫，出身與其天資高下，教育程度，生活習慣，乃至彼此間的關係，他們所掌握部隊的數量、素質與配備，簡直是有問必答，無所不知！甚至於連當時的日本專業間諜、密探，也無法望其項背！丁文江對北洋軍閥研究到如此透澈，熟悉到這種程度，當下令蔣廷黻

都爲之驚異不置，認爲他在這一方面的智識，豐富而準確得「駭人」！

丁文江緊接着又滔滔不絕的說他個人對於北洋軍閥的觀感，他說有許多北洋軍閥都是愛國者，最低限度也會起過愛國的念頭，而且他們之間大都有絕佳的天資，可惜的是他們未能接受近代化的教育，他曾強調，如果這些北洋軍閥早年接受過近代化教育的話，他們很可能會對國家作很大的貢獻，說不定真能救中國，爲社會和老百姓們造福。

給蔣廷黻上了一課

送適

之用之微之福香山居

留君玉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後以

聽爾深夜聲海天漠不哀歡。

逢君每覺青乘眼顧我而今白髮鬢。此別

原知句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詩適胡贈書手江文丁

聽了丁文江一席詳盡而精確的分析，使蔣廷黻對北洋軍閥的觀感全盤改換，回國之初的蔣廷黻，一直以爲北洋軍閥都是些土匪強盜，對於他們禍國殃民的作爲深惡痛絕，但是當他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獲得了他感到滿意的回答之後，他終於坦然的直承：

「我完全錯了。」

蔣廷黻所提出的問題是：

「像曹錕那樣的人，他能有什麼長處，怎麼會成爲北洋軍閥的巨頭？」

丁文江便向蔣廷黻約略敘述曹錕的簡歷，他怎樣從一名沿街叫賣的布販，目不識丁的莽夫，而成爲北洋第三鎮的統制官（師長、北洋第三鎮是袁世凱看家的隊伍），以至於直魯豫巡閱使、賄選北洋總統。然後，他又說了一個曹錕的故事。

他說當曹錕的第三鎮駐防保定時期，有一次曹錕看見一名小兵在放聲大哭，曹錕親自去問他是怎麼一回事？小兵說他剛剛接到了家信，曉得他父親病重，醫生說已經沒法治了。曹錕登時就給這名小兵幾十塊錢，叫他趕緊回家送終安葬，然後再回營當差。——（丁文江在說明曹錕能跟士兵接近，慣施小惠，因而北洋軍隊都說唯有曹大帥頂厚道）。

蔣廷黻說：他在外國留學十年，那一天聽到了丁文江的一席長談，——是爲他研究中國實際政治的第一課。他形容自己的發問：就像學生在問老師。

丁文江對於全國軍事概況之熟稔，其實是不足驚異的，因爲他從政的興趣極厚，所以他在這個大題目上，化費了不少的心血，作爲深入而精密的研究。在他那麼許多學術性的論著之外，他還留有好些篇極富史料價值的著作，如他用宗澹署名發表的「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奉直兩軍的形勢」、「奉直戰爭真相」、「廣東

軍隊概略」、「裁兵計劃的討論」、「湖南軍隊的概略」、以及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民國軍事近紀」等，他似乎又是一位著述甚豐的軍事學家了。

董顯光如約到上海相晤後，曾與丁文江談了三天，最後，丁文江不得不承認董顯光確有過返天津、繼續辦報的必要，他無法強留董顯光出任上海交涉使。董顯光旋即返津，但是丁文江仍視他為最高顧問，但凡在上海有交涉事務，他便隨時和董顯光接洽商量。

孫傳芳請丁文江當淞滬商埠督辦，他畀予他最主要的任務是站在中國地方當局的立場，跟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交涉聯絡，打成一片。所以他除了市政規劃以外，工作重心乃在於涉外事項，他顯得非常忙碌，但當他與沖沖的大權在握，從事實際政治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雄師，已在步步進逼京滬兩大據點了。

丁文江批評他的頂頭上司，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他說孫傳芳在北洋軍閥首要中，不失為頗有才智，愛惜羽毛，同時也很想把事情辦好的一員。不過，他有一項北洋軍閥的通病：近代知識過於匱乏。當北伐大軍節節推進，孫傳芳在長江中游的重要據點武穴吃緊，其間還曾有一段祕辛。因為孫傳芳自忖不敵 蔣總司令的淩厲攻勢，深有勢孤力單之感，正在覷顏向奉軍總司令張作霖，和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祕密聯繫，打算以殘餘的軍閥力量結成聯合陣線，謀與國民革命軍對抗。

他手下的江蘇省長陳陶遺，和淞滬商埠總辦丁文江得着消息，認為與二張聯手大為不妥，於是兩人相約往見孫傳芳，跟他澈底的談一談，丁文江和陳陶遺一同到了孫傳芳的住處，孫傳芳正躺在鴉片烟榻上吞雲吐霧，丁陳二人坐在鴉片榻前相繼陳詞，孫傳芳一面抽煙，一面在聽。聽完了以後他說：

「我本來也曾想過，不如向黨軍妥協。可是請你們二位看一看這個電報。」

張作霖孫傳芳合作

電報是孫傳芳手下的第一員大將，正當武穴方面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他那封密電的大意是說：風聞聯帥有與黨軍妥協的謠傳，消息傳來，軍心爲之不振，因爲黨軍是南方人而我們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受制於南方人之下，將來的日子一定不好過，與其來日爲南方人捉弄，反不如促成北方人的大聯合。

等丁文江、陳陶遺二人都看過了這封密電，孫傳芳方始下個結論說：

「我不能不向張家（指張作霖、張宗昌是義父子）妥協，否則我就站不住。」

當時，丁文江曾極力陳言：

「聯帥要是和二張妥協，那麼在政治上同樣的也是站不住。」

孫傳芳却放下鴉片烟槍，一聲長歎的說：

「那我就管不了這許多了。」

向國民革命軍妥協之策既不能用，丁文江、陳陶遺唯有廢然相偕辭出，他們看準了孫傳芳大勢已去，不可爲矣，從此便開始作拔腿抽身的打算。當時孫傳芳爲充裕戰費，謀背城借一，曾經請丁文江代向英國洽借一千萬金鎊，這樁交涉始終沒有辦成，北伐東路軍兵過杭州，上海告急，丁文江將近一年的政治生涯不得不宣告結束，民國十五年底，他逃到了大連，在那逃亡軍閥政客畢集的避難所，埋頭讀書，不問外事。直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第二期北伐時，丁文江先已回北京，日本軍閥企圖阻遏北伐軍攻勢，公然支持連戰連北的孫傳芳和張宗昌，又釀成舉世側目的濟南五卅慘案。丁文江用退職不久的北政府司法總長羅文幹所執有的北政府外交部密碼，打了個電報給孫傳芳，勸他即使是從事內爭，也要以國家立場爲重，不可再跟着張宗昌胡搞一起，甘

願爲日本軍閥的爪牙，依附於日本武力之下。但是這封密電竟會被奉軍截獲，差點給羅文幹惹上一場大禍，丁文江自己也嚇得溜之大吉。

丁文江以「改良主義者」自居，投靠軍閥當了一年的官，其結果是終告失敗，天涯遁逃。他曾對胡適自我解嘲的說：

「許子將（劭）說曹孟德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能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吧！」

這等於是他在承認，他能把事辦好，但却不是革命的材料。

書生從政，落了一次水，對丁文江本人所生的影響，豈僅是「最被人誤會」、「最不瞭解或責備」而已，朱家驊先生也曾說過：「淞滬總辦這一段事蹟，是他最受批評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他生平的恥辱。」民國十六年朱家驊在中山大學校長任內，很想幫丁文江的忙，請他担任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但是終礙於各方面空氣對他十分惡劣，連往後成爲丁文江知交的若干人，都極力反對，因而無法實現。他卸任淞滬商埠督辦一職後，蟄居北京德國飯店，和多年老友湯中隔室而住，他告訴湯中，他是因爲孫傳芳反對張作霖於先，又跑到天津，屈膝於其坐前于後，方始憤然其「認敵作友，颯顏事仇」，一旦意見不合，因而拂袖以去的。爲此，他還曾寫了一首寄情感慨的舊詩，其中有兩句是：

「爲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至於當了一年天下第一肥缺的淞滬商務總辦，丁文江到底「撈」了多少鈔票呢？事實上，他也曾坦白的告訴過湯中說：

「我在上海只節省下薪水三千元，可是已被我大家庭中的人要去了。」

慷慨楊金雪中送炭

從此以後，丁文江不但職業無着，生活也很艱窘，兩夫婦住德國飯店的兩個房間，坐一輛破舊黃包車。十七年電促孫傳芳與日人勾結，爲奉軍當局截獲，丁文江當時的處境，非常危險，他亟於逃往久已淪於日本，已成逃亡軍閥政客麀集的避難所——大連。一時之間，連兩個人的旅費都無法籌措，因此，還引出了一段早年騰傳人口，議論紛紛，實足成爲一宗美談的誰何雪中送炭，餽贈五千大洋的公案。

原來有一個不識字的工人楊金，曾經跟一位美國工程師，跨洋旅美，學了一手鑽礦術。回國後楊金却無以自活，流浪落魄。偶然有人勸他上北京，找一位「開礦的專家」丁文江，楊金也就貿貿然的去了。他見到了文江當面一談，丁文江曉得他對鑽礦術很內行，登時就介紹他到一家礦場去工作。過了幾年，丁文江早把這回事給忘了。可是有一天楊金忽然專程到北京造訪，他說他承蒙丁文江的幫助，得了很好的職業，已經攢下不少的錢，他是特地帶了兩千大洋來送給丁文江的，他說：

「我要是不得丁所長的幫忙，那裏會有今天，這點兒心意，務必請丁所長賞光收下。」

丁文江當然不肯要他的錢，但是楊金却非送不可。推辭了好半天，丁文江驀地想起，地質調查所正在籌設圖書館，苦於經費沒有着落，他便很誠懇的對楊金說：

「目前我的境況，雖然並不怎麼富裕，可是日子勉強得過，這筆錢我斷乎不會收。你如果非讓我收下不可，那麼，我就收你一半，代你捐給地質調查所籌備設立的圖書館。看你是願不願意？」

楊金聽說丁文江肯收一半，自己的心願已了，管他是做什麼用途呢？當時，就慨然的答應了，又過了幾年，楊金改了行，在徐州經營麵粉廠，發了一百多萬的財。某日，他偶然之間聽到了丁文江的一名學生趙鑑衡說：

丁文江當了一任淞滬商埠總辦，但却兩袖空空，一貧如洗，正陷在北京德國飯店，亟於逃脫奉軍的虎口。趙鑑衡有意湊兩千塊大洋，匯給他老師濟急，可是又怕丁文江那狷介高潔的脾氣，決不會無緣無故接受人家餽贈的金錢，因而正自躊躇難決。楊金一聽這話，當下就說：

「我受過丁所長的大恩，一向圖報無門，如今丁所長既有大難，送他點錢，我正是求之不得。趙先生，我看你也並不怎麼寬裕，說句您別見外的話，就讓我給丁所長匯五千大洋去吧。」

可是，趙鑑衡執意不肯，他必欲附贈兩千大洋，而且他還要求楊金，請他獨担餽贈的名義，免得丁文江推却。兩個人商量好了，再籌劃這五千元如何寄法？兩人一致同意，由楊金出面，寫一封信給丁文江，說明他的一片至誠，勸丁文江權當借用，暫且收下，將來有了錢再還他。計議既定，却是又發生了問題，楊金是個不識字的大財主，他只能寫一個胡桃大的「楊」字，而趙鑑衡却又怕丁老師認出了他的筆跡，找別人代筆，還怕傳聞出去，影響了丁文江的清譽，幾經曲折，方始找到了丁文江的朋友劉季辰，乾脆用他的名義，致函丁文江代為表明楊金的「耿耿此懷，區區微忱。」

因此，在北京德國飯店情勢緊急，猶仍日處愁城的丁文江夫婦，一日忽得徐州楊樹誠（楊金新取的號）寄來的五千元鉅款，和劉季辰所寫說明種切的一封信，正有如涸轍之鮒，忽焉甘霖沛然而降，他領了那筆錢走大連，閉戶讀書，不問外務，渡過了他一生中最高危、最苦難、暗淡的歲月。

民國二十年以前，丁文江一直都在賦閑、失業，楊金和趙鑑衡合贈的那五千大洋，是支持他挺下去為最大力量。可是直到丁文江死，他始終以為五千大洋全是楊金送的，他在地質調查所所教的學生趙鑑衡也送了他兩千元，由於楊趙遵守諾言，嚴予保密，丁文江竟毫無所知。

國民革命軍第二期北伐告成，全國統一，丁文江祇做過短短一年的淞滬商埠總辦，然不在逃亡軍閥政客的

通緝之列。所以他在大連蟄居一段時期，終於又回到了北平。地質調查所由他的得力助手×××主持，由於政府經費困難，欠薪欠到了半年以上。多年來由丁文江陸續延攬的中外地質學者，幾乎無以為生，最糟的是他特地從美國請來的那位地質學權威葛利普教授，葛利普的本職是北京大學教授，可是此公之狷介，也跟丁文江一樣，他堅持兼職不兼薪的原則，北大當局不好意思佔用他的精力和時間，只請他做指導研究生的工作。

等到地質調查所的薪水一欠就是半年，葛利普毫無進項，生活就越來越困難，起先他逐漸的降低生活水準，由美國化降到中國化，再降到升斗小民的程度，可是，半年以後，他羅掘俱空，真的活不下去了。這件事，使丁文江深覺拖累了葛利普，內心至為抱愧，偏偏又愛莫能助。幸好羅家倫出長清華大學，想增設一個地理學系，羅家倫素來敬重葛利普的品格和學問，他禮聘葛利普擔任清華地理系的教授，主動提出願意昇以每月六百元大洋的專任教授全薪，沒想到葛利普一絲不苟，他拒絕接受，他說他實際上並非專任，所以他拒受薪水，經過羅家倫再三解說，他才勉允月支二百八十元車馬費。葛利普的生活問題從此解決，丁文江心頭的一方巨石，方始輕輕的擱下。

可是他本人却仍然沒有正式職業，北大當局和學生，曾經一再請他到北大去任教，他總是以「沒有充份的時間」為托詞而拒絕，大概是在民國十七年以後，北大又一度跟他接洽為他開一門功課，當時北大當局的擬議是開一門「中國西南地質」這個課目一經提起，反而惹得丁文江發了大脾氣，他憤憤然的說：

「什麼西南地質，西北地質的一大套呀！地質是整個的，縱使各地稍有不同，也沒有另設專課的必要。要是照這樣分門別類的開起課來，叫學生花多少時間才够分配？我根本就不贊成這個辦法，所以我不能教！」

再經過往返交涉，丁文江方始允可出任北大的地質學教授。

丁文江教書，認真負責，煞費苦心，簡直可以說是施盡了全身解數。他那門「地質學」的教材，決不以教

科書所包括的範圍爲已足，他還得「普通專門、古今中外」，到處去搜求關係材料。所以每逢他上課的時候，他帶的不是洋裝巨冊的大書，而是零星的單篇，專寫的筆記，和一批批的標本和掛圖，標本掛圖靠他一個人的力量難以羅致齊全，於是他就發動中外友人幫忙去找，務必求其盡善盡美，無所不備。受他請託次數最多的當然是地質調查所，因此地質調查所的工作人員，大家都在說如下的一句笑話：

「丁先生到北大教書，一則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二來我們的標本也教他給弄破產了。」

在北大名教授羣中，丁文江得算是很會講話的一位，因爲他學識淵博，見聞廣洽，所以他能用順手拈來的掌故小說，戲劇歌謠，加以科學的解釋。科學理論本來是聽來枯燥無味的，但是在班上的學生，一聽他講起來便笑口常開，精神百倍。例如他有一次問學生說：

「他們都聽見過『鳳陽花鼓』，可是你們有誰知道那裏面最重要的兩句歌詞：『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究竟是什麼緣故？」

班上的學生沒有一個答得上來，於是丁文江便自己提出答案，他說：

「安徽鳳陽本來是最富庶的地方，但是在明太祖洪武初年黃河改了道，在那將改未改的時候，黃河水經常泛濫成災，所以『花鼓歌』要唱『十年倒有九年荒』了。」

接下來，他便再講黃河改道的原因，和河水泛濫的原理，使他班上的學生，一致獲得很深刻的印象。

又爲他曾提過一句江蘇流行的諺語：「三山六水一分田」，使那難於記憶的地球表面山水與平原所佔面積的比例，因爲地球上恰好是三分山，六分水，一分平原；亦即可耕的田地，講授到地質學上的「基性火成岩的風化情況」，丁文江會取出一塊馬蹄形的石頭，那正是基性火成岩風化後的標本，然後他亦莊亦諧的告訴他的學生：

「你們看這塊石頭像不像一個馬蹄印子，這種石頭俗話叫做馬蹄石，據說是當年掛帥的穆桂英她所騎的桃花馬所踏成的，在山西北部到處可見。」

民國十七八年間，丁文江曾兩度組隊，深入黔桂考察地質，十七年的廣西行使他發現了馳名中外的馬平石灰岩，和南丹、河池的錫礦、遷江一帶的煤田。十八年他組成規模甚大的西南地質調查隊，他自己率領曾世英、王曰倫等由貴州松坎、桐梓到遵義，再往西走以迄大定。原先計劃在大定和青年地質學家趙亞曾所率的一隊會師，趙亞曾一隊所走的路線是從四川敘府入雲南，但却不幸在雲南北部的開心場遇匪，趙亞曾遇害喪生，使丁文江受了很大的打擊。——趙亞曾一向是他最器重的學生，先是民國十八年胡適回到北平，當天就在一次宴會中碰到了丁文江。丁文江一見胡適便歡聲大叫：

「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曾！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才，今年得了地質學獎金的。」

當時他臉上的高興與快樂，曾使胡適深切感動。——趙亞曾死後丁文江哭了許多次，並且到處爲他徵募撫卹金。趙亞曾的遺孤由他負責教育，每年暑假歇夏都帶着他一道，以便親自爲這孩子補習功課。後來丁文江搬回南京，這孩子也與他同行。

不能治·那就放心了

從民國二十年秋到二十三年丁文江都在北大教書，他在北平沙灘松公府，爲北大籌建了一座地質館，使北大地質系的教學設備益臻完善，時人乃稱這一段期間爲「北大地質的黃金時代」。民國二十二年他曾代表我國出席第十六屆萬國地質學會於華盛頓及紐約，宣讀「中國石灰記及二疊記地層層位」兩篇論文。會後他重游歐

洲，訪問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學，又順道赴瑞典會晤他的老友安特生，然後赴蘇聯，參觀巴庫油田，自蘇國後他得了一種怪病，左脚大拇指發麻。他上北平協和醫院治療在協和的名醫診察完畢後，醫生和病人，會如下一段膾炙人口的問題：

先是丁文江問醫生：

「要緊不要緊？」

「大概不要緊。」

「能治不能治？」

「不能治。」

「那就好了。」丁文江登時若無其事的，穿上衣服就走。事後，他告訴傅斯年，他這一段治病的經過，和醫生的對答。

丁文江說是

「一聽醫生說我這個病不能治，當時就放心了。」

傅斯年不禁驚異的問：

「醫生說你的病不能治，你怎麼反倒放心了呢？」

「假如我這個病能治，那我當然就想法子治它，」丁文江莞爾一笑的說：「醫生既然說了不能治的話，乾脆我不想它就是了。」

丁定江出身江蘇泰興的名門望族，他家素來以周卹戚黨，樂善好施而聞名，他的高曾祖即在當地置有義莊。丁文江的父親丁吉菴，一年到頭都在為地方公益，排難解紛而忙碌緊張。小孩子的教養全部交由丁文江的

母親單太夫人負責。丁文江共有七兄弟，同母的兄一弟二，異母的小弟第三個，大致從他異母弟老四以上，一應求學費用完全由他負擔，因此朋友常說他小家庭開銷小，大家庭開銷大，肩頭上的担子是沉重的。據他的弟弟爲他算的賬，從丁文江二十六歲到四十六歲爲止，他曾先後負擔過下列四項開支：

一、每年給他舅舅五百元的生活費。

二、收入不豐的兄弟每人每年津貼三百元。

三、四個弟弟，一個侄兒從小學到大學、留學的全部教育費用。

四、大家庭中任何一人的意外遭遇開支。

由而可知整個大家庭的重心，和經濟重壓全加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以一位學人勞心勞力之所得，應付這麼大的開銷，居然能够一輩子不負債，實在是個奇跡。北伐以後丁文江失業的那一年，傅斯年曾問起他的經濟狀況，問他：

「你小家庭外，大家庭內，連同接濟親戚，你一共得負擔多少錢？」

丁文江的回答是：

「今年兩千。」

那還是指他全無收入的失業期間而言。

丁文江的小家庭，除了疾病的陰影，始終過得幸福而平靜，他和他的夫人史久元，思想和生活習慣，都有相當的距離，但是他對他夫人的溫存體貼，恩恩愛愛，傅斯年說即令是少年恩愛夫妻，也不過如此。史久元婚後二十年，不斷的在生病，而丁文江也就侍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他是她的保護者兼看護生，使他的朋友交口讚譽他是一位模範丈夫。

但是這位模範丈夫談起男女間的性關係來。他却並不反對「自由生活」，他主張人的「性本能」應導之於正，莫失却一個人的精神平衡，不妨礙到他的「用處」和本業，祇要在這個大前提下，戀愛固可，連娶妾也未必有害。當徐志摩和陸小曼陷於畸戀，丁文江曾經表示反對。不過他聲明他之所以反對是由於徐陸結婚以後，徐志摩就無法工作。

民國二十一年春，朱家驊出任教育部長，一度有意聘丁文江為中央大學校長，不得結果而罷。二十三年夏，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猝卒，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子民）首先提名「丁文江是超科學家」的諷詞。不過蔡元培一力堅持，朱家驊也力為贊成，學術文化界人士對他具有好感的，亦復不少。丁文江自己則在接到聘約之初，頗費躊躇。他所担心的不是嫉妬者的流言中傷，百計阻撓，而是考慮自己的健康與體力，能否勝任？丁文江在死前十年，有一句經常掛嘴邊的話，他總是憂鬱的說：

「我不會活過五十歲，因為我父系三代，都沒有活過這個大限的。」

這話後來到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他正好死在四十九歲頭上。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到中央研究院赴任之前，丁文江曾去協和醫院，作了一次很徹底的體格檢查，結論是他的健康並無問題，他這才欣然的全家搬到燕京，就任新職。從二十三年七月到二十四年十二月，他一共當了一年半總幹事。就任宣示他的辦事原則。第一、他要求分工合作。第二、他認為唯有科學的智識才是真知識，而真知識之取得，應該具備下列兩項條件：

一、由一羣受過實際訓練的人做基礎工作。

二、以一個健全的組織，作為神經中樞，負起安排調度的責任。

此外，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原則，那便是——他說中國既然是一個窮國家，那麼，無論根據什麼理由，只要浪費金錢就是罪惡。

丁文江對於中央研究所作的最大貢獻，厥為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七日由他一手建立的評議會，胡適曾稱此一貢獻：「使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構，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往後也當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朱家驊也說：

「評議會的成立，是在君先生替中央研究院立下了百年大計。有了評議會，才有後來的院士會議，有了院士會議，研究院的體制才正式完成，這是我們同仁所深深感謝的。」

民國二十四年底，丁文江應國民政府鐵道部之邀，到粵漢鐵路兩側勘察湖南的煤礦，同時他也想去看幾所有名的學校。二十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他抵達長沙，當時朱經農在當湖南教育廳長，他怕長沙的旅館嘈雜，特地在長沙火車站一接到丁文江連連搖頭的說：

「我這次到湖南來，領得有公家的旅費，不應該再打擾地方政府。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自己住棧房，使我自己心安。」

這個場面相當的窘，經過往迎的人員再三勸說，又因為夜已深了。丁文江方始應允，姑且在招待所住，覺得十分清靜，陳通伯先一日動身回了武昌，但是楊今甫說：「只要丁文江答應住下，另一位朋友清華大學教授張子高一定搬來。他鄉遇故知，正好客中盤桓，丁文江終於安心的住下了。」

深夜方到，第二天一早八點鐘就開始工作，邀來湖南地質調查所的同仁。攤開湖南各地煤礦的藍圖，研究討論，九點多鐘朱經農來邀他同往參觀明德中學，看見這種情形覺得不便打攪，還退到楊今甫的房裏去等了一

個鐘頭。

丁文江告訴朱經農，他這次到湖南一定要見到兩個人。其一是曾經勸他留學的前泰興知縣龍研仙的夫人，其二是明德中學校長胡子靖，當年他以十四歲的少年東渡日本，便是胡子靖帶他同去的。然而他這兩個願望居然都失之交臂，未曾達到。說來也是非常的巧合。

十二月三日朱經農特地陪丁文江參觀明德，目的就在訪胡子靖，可是偏巧胡子靖因事外出，不在學校。五日一早他正要赴南嶽衡山，調查地質，並且順道訪謁他的師母龍研仙夫人，胡子靖命人送了封信來，邀他再赴明德演講，並且還要請他吃飯。丁文江啓程在即，只好匆匆的寫了個便條回復，中有佳句云：

「講演肚裏空，吃飯肚裏實。」

但是他仍然約定在同長沙後，將「再度詣校，俾把臂長談。」

五日中午抵達南嶽衡山，僱了三乘轎子，朱經農、張子高乘轎，丁文江則徒步攀援，一路觀察岩石，測量氣候，他們會到烈光亭瞻仰龍研仙的紀念碑，並且徘徊良久，丁感慨歎獻的說起龍研仙對他的知遇培養之恩，當夜宿於半山亭下的中國旅行社新屋，他還作了兩首「烈光亭懷先師龍研仙先生」，原詩如下：

十五初來拜我師，爲文試論西南夷；半生走遍瀛緬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海外歸來初入湘，長沙拜謁再登堂，回首廿五年前事，天柱峯前淚滿腔。

詩不太好，但見其真情流露，不盡低徊而已。

如何中毒 彷彿是謎

六日再登南天門，繼續截測，七日清晨乘粵漢鐵路局派來的汽車，前往潭家山探礦，朱經農、張子高先回長

沙。丁文江八日再乘原車到衡陽，當晚渡江到粵漢鐵路局長凌鴻勳的家。苗圃嘉樹軒。丁文江和凌鴻勳在民國十一年時即已結識於北京，丁文江任淞滬商埠總辦，凌鴻勳正當交通大學校長。兩個人是時相過從的多年老友，重晤之餘倍感欣幸。凌鴻勳尤因丁文江的惠然肯來感到興奮，他們相對茗談，從湖南的煤礦談到國家大事，丁文江認爲他們那一輩的壯年學者亟應以有自奮，趁此盛壯之年急起苦幹，爲國家建事業，爲後學樹楷模。但是他又感慨歲月蹉跎，新猷未能多展，言次頗有些責備賢者之意。凌鴻勳當時就有點詫異，因爲他發覺丁文江談鋒之健，與乎挾磊之傾吐，爲他們結識以後從未有者。

那天晚上丁文江在凌鴻勳家吃飯，飯後，又談到九點鐘，方由凌鴻勳親自送他到粵漢鐵路局招待所，這一送，就將丁文江送進了鬼門關。

招待所房間很小，裝得有一座壁爐，丁文江進招待所後先洗澡，浴罷回房，一生注重科學，曾有一「超科學家」之稱的丁文江，居然會作了番違反常理的安排，委實令人不可思議。他那個小房間裏的壁爐，是先一天下午就生好了火的，煤火已經燒了一個半白天帶一夜，房間裏自然不乏煤氣，但是他却竟在臨睡之前，吩咐侍役多添煤火，再把窗門緊閉。

照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淵，亦即丁文江所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他往後的說法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不得其解。丁文淵說：

……曾下礦視察，出汗很多，回寓沐浴，侍役無知，在一個已經閉塞的壁爐內生火取暖，因此中了煤毒！又爲一個無知的鐵路醫官，急於見功，不問好歹的施行橫蠻的人工呼吸，致將他的肋骨弄斷。當時病人已無知覺，所以沒有發現。當天翁詠寬奉命乘了蔣先生的私人飛機到衡陽去看他。至今不能理解的，翁先生沒有用飛機將他順便帶回南京，而讓他用卡車送往長沙湘雅醫院去休養。很負時譽的楊濟時醫師，竟大意的沒有仔細檢

查，根本沒有發覺肋骨的斷折。到十二月中旬（陰曆）傅孟真（斯年）奇異他還沒有恢復，趕到長沙去看他，他說肋骨常痛，孟真另請一英國醫師診視，才診斷出他的肋骨已經因傷生膿，結成了膿胸。因為時間太久，雖然開刀了兩次，仍然無效，到二十五年一月五日竟不治而死。」

那位「很負時譽」的楊濟時醫師，正是長沙湘雅醫院的內科主任，他曾爲丁文江之死作了一份將近兩千言的「治療經過報告」，原文登在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一八九號。此外則該刊又登有鍾伯謙的一篇短文「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譚家山潭昭煤礦公司情形」，證實他曾在中毒之前一日，確曾下礦視察，就是沒有提起他曾出了一身大汗。而鍾伯謙這篇文章，係奉朱經農之囑寫的。

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那夜，丁文江因爲他到長沙後一連三夜都失眠，八日睡前照例服食一粒珂達令安眠藥，然後就熄燈就寢。十二月九日早上七點多鐘，粵漢路株韶段路局的同仁和招待所兩位住客在進早餐，偏是丁文江沒有起床。路局中人曉得他和凌鴻勛約好了是晨偕往耒陽。於是有人命丁文江的僕從進屋去看看，因爲丁文江的房門並未下鍵，從僕推門而入，看見丁文江正熟睡未醒，他喊幾聲，不問回應，再搖撼他的手臂，丁文江却彷彿毫無知覺，楊濟時的報告書中說：「應該從人十分鐘之呼喚不醒，因疑有異，即請路局陳醫師前來診視，此爲九日晨八時左右事。」但是凌鴻勛在他的「悼丁在君先生」一文中則謂：「九日晨七時半余扣先生戶知尙未起，其僕謂久撼而未醒也。室中有壁爐，曾於先一日下午生火，先生（指丁文江）睡時將所有氣窗關閉，於是同人決爲中毒。立召鐵路陳、袁二醫生至，時呼吸仍有，而脈已微。急施救治，不見醒轉，旋察其枕下還有安眠藥少去三片，因決係夜睡過熟致中毒不覺。因一面召教會仁濟醫院美人布醫生，一面電囑朱經農兄覓一良醫來衡。是日午間由公寓移往仁濟醫院，是夜湘雅楊濟時醫生至。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見醒，余乃急電翁詠寬先生，而在君先生於十日即已醒轉。翌日翁詠寬先生偕醫生至，在君先生已能言語，盡憶前事，相與大慰。」

，以衡地醫院設備不週，因商定稍俟即移在長沙湘雅「休養」。十五日先生身體大有進步，湘雅醫生復來，以為正宜移居湘雅。因由楊醫生與鐵路陳醫生陪同先生赴長。余以工務逼迫，於先生赴長之翌日即南下勘工。旋得湘雅楊醫生書謂：「丁先生病狀大有起色，肺部經用X光檢查甚為健全。數日之後，即可就愈云云，為之大慰。詎意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牽動舊恙，情形惡化，一月五日竟爾不起！余自別先生後即由粵赴京，迨余復由京至粵之日，正先生彌留之際，竟未及再與先生一面，嗚呼，傷已。」

再看朱經農的說法：

朱經農說得很詳細

「七日清晨，在君乘粵漢路局派來之汽車赴譚家山勘礦，予高與我同回長沙，他在譚家山勘礦的情形我不大清楚，無法記載。只曉得他八日乘車赴衡陽，當晚渡江在凌竹銘（鴻勛）先生家裏晚餐，聚談甚歡。因為江東無旅館，所以凌先生留他在路局招待所過夜。約定次日上午八時赴耒陽勘礦。是晚烈風驟雨，溫度陡降。在君先生登山、下礦之後，身體倦極，非常畏寒。故將室內門窗全閉，沐浴入寢，倒頭便睡。誰知風雨過猛，壁爐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內，遂致中毒。（似乎是入情入理，也比較科學點的說法。）九日清晨，僕人入室呼在君先生不醒，見其呼吸急促，面色異常。乃邀路局陳醫生來診，始知係中煤毒。醫生三人輪流施人工呼吸，歷五小時半，未見清醒。乃用鐵床，將在君先生載運過江，送入仁濟醫院救治，一面由凌竹銘先生用電報及長途電話，託我在長沙延醫往救。」

朱經農又追憶的說：

「九日上午，我尚接到在君先生來電，謂定十日返長沙，即日轉車回京，因都中另有要事，議其速歸。故

變更原定旅程。該電係八日晚間預撥，託人代發。所以下午四時由建設廳轉來電話，謂在君病重，尙覺疑信參半。五時左右，接到竹銘長電，才知在君中煤毒，歷久不醒。立即用電話與湘雅醫院商量，承王院長特別幫忙，允請內科主任楊濟時大夫即刻赴衡。當時湘中真有匪警，公路局汽車正派出當差，一時無車可借。迫不得已乃向財政廳何孟吾（浩若）先生公館借其私人所用之車。其時何先生不在長沙，他的汽車夫經驗不足，不敢開夜車，所以車雖借得，無人駕駛，依然不能出發。後來還是建設廳余劍秋廳長在公路局調到一車，將楊醫生送往衡陽，直至深夜，方才到達。其時在君先生依然不省人事，當地醫生認爲希望極少，經楊醫生詳加檢驗，知體內水份已竭，血液凝滯。乃於次晨注射多量鹽水，並灌葡萄糖汁，以維其體力，直至十日晚間開始有轉機，十一日上午四時漸漸清醒過來。」

朱經農不憚其詳的繼續往下說道：

「十一日上午翁詠寬（文灝）、丁巽甫諸先生偕在君先生第七令弟乘飛機來長沙，隨即換乘汽車前往衡陽，我亦隨行。抵衡陽時天色已晚，於暮靄蒼茫，萬家燈火中，入城赴醫院，探視在君先生病狀。既至楊前，彼（指丁文江）即低呼經農，聲極微弱，不易辨明。問其有無痛苦？微呻而已。當九日下午楊醫生未到以前，衡陽各醫師用器械，阻其牙關緊閉，並拔去牙齒三顆，口腔喉頭均被擦破，至此漸覺痛楚。」——十二日清晨再往探視，則在君先生神志清醒，言語時聲音雖小，但有條理，因恐其過於費力，未敢多談。與翁詠寬先生同來之南京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戚壽南大夫，詳加檢驗之後，認爲經過良好。在君先生亦強作笑容，以慰來衡問疾之人。自朝至夕，病情頗有進步。」

朱經農於焉又說：

「十三日黎明，翁詠寬先生等離衡返京，戚大夫及我亦同行，在君先生病狀似漸入佳境，十五日楊濟時大

恢復由長沙赴衡，與衡城醫生會議之後，決定將在君先生遷往長沙。因為衡陽方面，醫院設備不甚完全，且少訓練有素之護士，故覺遷往湘雅，療治稍易。承凌竹銘（鴻勳）先生及衡陽路局諸友好竭力幫忙，將路局大貨車改裝成病車，連床載運來省（省垣長沙），直達湘雅醫院。楊醫生及路局陳醫生、夏主任等均隨車護送至長沙。入院以後，情形甚好。用X光檢驗，發現心肺諸部均未受傷。復經辜樂懿女醫師診治，口腔及喉管亦平復如常。惟滿身疼痛，胸前尤甚。十七日以後，溫度脈博均漸復常態。不久傅孟眞（斯年）先生由北平來湘探病，丁夫人及在君之第五令弟（文治）亦由南京趕到。親朋歡聚，病者精神爲之一振。至二十二日下午，在君強欲起床，且言明日必須自入浴室沐浴一次，醫者不許。二十三日上午，得醫生許，經人扶掖至椅上小坐。一小時後覺胸前痛苦陡增，不能支持，乃復上床靜臥。午後體溫增高，至二十四日溫度續增四十度左右。經外科主任辜仁醫生（Dr. Graen）檢驗，發現胸間有膿。日間灌輸氧氣，以減少其呼吸的困難，當晚施用手術，取出膿水五百CC之多，次日復取出膿水少許溫度脈博又漸復常態。是日我至牀前，設法安慰在君，告以膿已取出，病根既去，必日見康復。他搖着頭說：「你的判斷不合科學。」

朱經農的這一段敘述，說明了兩點最重要的事實，那便是：第一，丁文江在他臨死的前幾天，早已獲知他終將不起。第二，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他總以「科學」爲第一要則。

翁文灝對得起他麼？

丁文江在極端痛苦中經過胸部穿孔手術，終於發現胸腔裏有淡紅色的膿液，從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他又度陷於神志不清，二十九，北京協和醫院的外科主任婁克斯（Dr. Loucks）替他開刀，查明白了他第五肋骨折斷，胸腔中的膿液裏又有了肺炎雙球菌，祇好給他留下一個二寸寬的出膿管，這時丁文江已在彌留狀態，用「救

治失時，羣醫束手」，斯為最正確的寫照，他一直拖到元月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溘然長逝。

死後，醫方診斷他的死因，一共有六項之多。是爲：一、一氧化碳中毒。二、左胸第五肋骨骨折。三、支氣管發炎。四、左胸積膿（肺炎雙球菌）。五、心臟衰退。六、腦中樞瘀斑出血。從以上所列舉諸人的敘述，與這個診斷中可以看出，丁文淵對於翁文灝之未能利用今總統 蔣公所派的專機，送丁文江赴南京急救，以及那位「無知的鐵路警官」，施行「橫蠻的人工呼吸」，致將丁文江的肋骨弄斷，還有楊濟時大夫的未能發現肋骨斷折，所作的抗議與指責，的確並非的放矢。因此，丁文江也就可以說是在人謀不臧的情形之下，錯中生錯，被誤死了的。

丁文江果然在四十九歲那年死了，英年溘逝，聞者傷悼。當時有人覺得奇怪，像他那麼一個精神抖擻，新鮮活跳的科學工作者，怎麼會中煤氣？難道他聞不到煤味？還是在聞到了以後無法掙扎得出？這個疑問，一年後由他的弟媳丁張紫珊洩露了一項祕密；同時也提供了令人滿意的答案，原來，丁文江的嗅覺從小就有毛病，後來他還在上海撞過一次火車，傷處，正好又在鼻子上，加以當晚他吃了安眠藥，他是在熟睡裏中了毒的。

早在二十四年三月七日，丁文江預先立好了遺囑，指定以他身故之地爲葬所，所佔墓地不得超過半畝，棺木應在一百元以下，還不准親屬開吊、發訃聞、唸經，「成徇其他糜費無益之習尚」——假使他身故有火葬設備，他希望能夠火化，同時，由於丁文江夫人無出，他在遺囑中特別聲明不得爲他立嗣，丁文江說：「因爲，現行法已廢除宗祧繼承」了。

至於遺產，丁文江在永明公司保了兩千英鎊的險，這筆錢，再加上中央研究院的卹金，丁文江指定給他的夫人作生活費，此外他有八種股票，一共賣了一萬七千另七十元，則按照他的遺囑，分爲八份，贈給他的六位兄弟。

遺著出版——拖十年

丁文江逝世之前，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七日，國民黨舉行五中全會，推選今總統蔣公爲行政院長，蔣公對丁文江的才華十分賞識，曾經破格邀他出任鐵道部長，明令即將發表，而丁文江已中毒誤死，所以當噩耗傳抵首都，蔣公至表震悼，中央研究院爲丁文江舉行追悼會，蔣公曾首先到會致祭。會中胡適和翁文灝都曾致悼詞，胡適特別提起丁文江生前常說的自嘲之語：「我們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翁文灝則繼述了文江運用古生物學在調查中國地質上的貢獻，那天他非常的傷感，才說了三句話立刻就扁嘴、紅眼、開始嗚咽墜泣起來了。本來嘛，翁文灝自民國三年在北平與丁文江結識，他一直是丁文江的老搭擋，當時翁文灝在地質研究所擔任主任教授，正苦於找不到人教古生物學，和丁文江談起，他當下就慨然應允，成爲我國教古生物學的第一人，五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當首任所長，翁文灝主持礦產股，這兩位在地質工作上向來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照說他們的友誼應該格外的真摯密切，不過拿「生死交情」的角度來看，則無人不認爲丁文江待翁文灝至厚，二十三年二月翁文灝在浙江武康車撞橋樑，受了重傷，當時丁文江正臥病協和醫院，朋友們設法瞞住他這個消息，偏偏給他報上閱及，丁文江馬上就要出院飛往杭州探視，醫生率直拒絕，他竟涕淚交流的跟醫生爭執，後來醫生高聲的說：

「你在這個時候離開醫院去坐車是極傻的事！即使你到得了杭州，你還是一個病人，對於你的朋友，又有什麼用處？」

丁文江想了想，終於又回到病房，自此，便在病牀上料理翁文灝的許多事，而且一天到晚都在喃喃自語的說：「詠寬這樣一個人，是死不得的！」

他還爲翁文灝扶病寫了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翁詠寬」，據翁文灝往後自承的說：

「丁在君先生在獨立評論發表『我所知道的翁詠寬』，差不多是一篇身後的墓誌銘。不料時未兩年，我猶健在，而在君先生竟已長逝，還是我在此地寫他死後的追憶！」

翁文灝又曾說過：

「我與在君先生相從二十餘年，承他待我爲友，我心中實敬他爲師。」

然而丁文江死後，翁文灝却難免丁氏家屬對他頗有微詞，例如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淵，除了指責翁文灝「沒有用蔣先生的私人飛機順便帶他回南京之外，他還公開指出，他是丁文江遺囑中指定的執行人，並且由丁文江指名要他整理他生前的遺著。但當丁文淵由德國聞耗返國，三月間回到了丁文江的南京寓所後，已經找不到丁文江任何遺著。據家人說，丁文江所有的著作被翁文灝拿走了。丁文淵詰問翁文灝時，翁文灝的答覆竟是：

「你老兄並沒有什麼遺著，在我這裏的，只有他在雲、貴、川三省調查的報告。這是一部專門著作，又不是你所能懂的，還是讓我替他整理代印吧！」

然而這一整理，居然是將近十年，從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直到三十四年間，始終不得這一部報告付印出版的消息，而丁文江在此中的若干理論，則早已爲地質界人所引用。丁文淵和李仲揆會再三催促，翁文灝方於抗戰勝利後，交出這一部書的原稿，由中央地質調查所代爲出版。

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來華訪問時，中國學術界推由丁文江擔任總招待，羅素在英國向有「民衆聖人」之稱，而他却又是貴族出身。因此，曾有一次，丁文江向羅素說：

「羅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由英國貴族產生的清品。」

羅素返國後，也曾向其國人公開揄揚丁文江，作爲同敬，他說：

「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最有才華，最有能力的人。」